

百花散文书系·古代部分

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# 歐陽修





百花散文书系·古代部分

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# 欧阳修散文选集

王永照 王宜瑗 选注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欧阳修散文选集/王水照, 王宜瑗选注.—3 版.  
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6  
(百花散文书系.古代部分)  
ISBN 978—7—5306—5407—1

I .欧... II. ①王...②王... III.古典散文—  
作品集—中国—北宋 IV. I 264.41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6310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\*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375 插页 2 字数 241 千字

2009 年 6 月第 3 版
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定价: 18.00 元

## 编辑例言

一、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,根深叶茂。它和诗歌一样,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,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。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,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,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,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,特编辑这套“中国古代散文丛书”,作为“百花散文书系”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。

二、散文文体范围,代有嬗变,古今不同。本丛书所选,以抒情、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。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,下迄于清代。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。各书篇目排次,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,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、演变轨迹。

三、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:一为论文,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、文学活动外,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,分析、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、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。一为散文,每篇均附加题解、注释。

四、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,以论文帮助

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,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,两相印证,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,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,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,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。

五、每书所选散文,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,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、不同题材、风格的文学性散文,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。

六、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、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、出处、版本等外,还对作品写作背景、思想价值、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,加以简明的评述。

七、注释以疏解难字、难词以及典故、职官、器物、人名、地名等为主。对其重要者、用法特殊者,并援引出处或例句,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# 欧阳修和他的散文

王水照

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,又达到了高度繁荣的新的质变点。其标志之一就是涌现了一批具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化名人。他们视野开阔,通古博今,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文化领域的巅峰,其本身往往是一代文化的结晶和代表。欧阳修就是北宋前期最早升起的一颗文化巨星。他作为当时文坛盟主,领导了宋代的古文运动,奠定了宋代散文的群体风格。他和梅尧臣、苏舜钦一起,开创了有宋一代诗歌的新面貌。在宋初词坛上,他和晏殊所组成的晏欧词派居主导地位。他又主持《新唐书》的编撰,并独立完成《新五代史》,在我国众多的史学家中,成就卓著。他以《易童子问》、《诗本义》等经学著作,开创了以务明大义、疑古辨伪为特征的“宋学”,与传统的神化经典、恪守传注的“汉学”相抗衡。他又是金石考古学的开拓者,我国第一部诗话著作的作者。他当之无愧地荣膺散文家、

诗人、词家、历史学家、经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诗歌评论家等多种称号。而作为散文家的欧阳修，他流传至今的五百余篇作品，是他文学创作中成就最高的部分，其重要的历史地位，尤引人注目。

## 一、古文创作初露锋芒(1031—1034)

欧阳修(1007—1072)现存的最早散文作品，写于宋仁宗天圣年间，在六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中，他勤奋地写作了近半个世纪。他的散文创作道路、散文特点的形成和成就的获得，跟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直接关联，也跟北宋的整个政治环境和社会情势密不可分。也就是说，散文创作、古文运动和政治革新三者在他身上是交互影响、同步行进的。

引导欧阳修走上古文写作之途的是韩愈。欧阳修四岁丧父，随母去随州投靠在那里任推官的叔父欧阳晔，遂长居该地。他在城南李尧辅家，第一次得见韩愈的文集：“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，发而视之，得唐《昌黎先生文集》六卷，脱落颠倒无次序。因乞李氏以归，读之，见其言深厚而雄博。然予犹少，未能悉究其义，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。”（《记旧本韩文后》）韩文在他孤贫力学的生活中不啻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原来唐中叶韩愈、柳宗元的古文运动成就突出却后继乏人，不久骈文重又抬头，到五代乃至宋初，浮泛靡丽的骈文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：一切官场应用文字，上起诏敕，下至判辞书牒，以及科举程文等皆用骈文。欧阳修为准备应举，自然也把学习骈文

作为重要日课。他追述说：“仆少孤贫，贪禄仕以养亲，不暇就师穷经，以学圣人之遗业，而涉猎书史。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，皆穿蠹经传，移此俚彼，以为浮薄，惟恐不悦于时人，非有卓然自立之言，如古人然。”（《与荆南乐秀才书》）正是以“顺时取誉”为目的的僵死卑弱的骈文为参照物，韩文“深厚而雄博”、“浩然无涯”的美学特征才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。

天圣元年（1023），十七岁的欧阳修参加随州州试，试题是《左氏失之诬论》。他的答卷尽管有“石言于宋，神降于莘。外蛇斗而内蛇伤，新鬼大而故鬼小”等“奇警之句”流传后世（《东轩笔录》卷十二），却以落官韵被黜。复又重读韩集，“喟然叹曰：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。……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，苟得禄矣，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。”（《记旧本韩文后》）立下了尽早摒弃骈文这块敲门砖，潜心研治韩文的志愿。这表明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，固然跟唐代古文运动一样，也标举明道师经的旗帜，但更具诱惑力的契机却是对韩文艺术特性、美学风范的钦羨和认同，这也预示着欧阳修今后的文论思想朝“重道更重文”的方向发展。

天圣八年，他终于进士及第，次年三月到洛阳出任西京留守推官，直至景祐元年（1034）秩满。这三年间，他积极参与了洛阳文人集团的诗文革新活动，是他古文创作的发轫期，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。

当时钱惟演任西京留守，大批文人学士聚集在他周围。从欧阳修《七交·自叙》、《书怀感事寄梅圣俞》等诗中，充分反映出名士荟萃的盛况。这个具有大致相同文

学好尚的文人集团,其实际领袖是通判谢绛,重要成员有尹洙、梅尧臣、欧阳修等。梅尧臣《依韵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诗见赠》云:“是时交朋最为盛,连值三相(指李迪、钱惟演、王曙)更保厘。谢公主盟交变古,欧阳才大何可涯。我于其间不量力,岂异鹏抃蒿鹳随。”在《依韵和王平甫见寄》中又说:“谢公唱西都,予预欧尹观。乃复元和盛,一变将为难。”俨然与韩、柳、元、白的元和时代先后比美,蔚成文学史上的大观。

这个颇为松散的文人群体虽然主要活动不过是“文酒聊相欢”、“崎岖寻石泉”的宴游生活,且尚未提出明确的诗文革新纲领,但毕竟是依照一定的文学趋尚而发生互动关系的共同体,也不能离开宋初以来诗文革新运动的整体发展。柳开、王禹偁等人首先对浮艳空泛的“五代体”发起攻击,提出复兴“古文”的要求。然而,以大中祥符年间《西昆酬唱集》结集为标志,西昆体时文又逐渐取代宋初早期古文中的地位。这又引起孙复、石介、穆修、苏舜钦等人的反对,西昆体时文的影响遂日趋减弱。更加上天圣七年仁宗下《贡举诏》戒除文弊,“比来流风之弊,至于荟萃小说,磔裂前言,竞为浮夸靡蔓之文,无益治道”,要求“学者务明先圣之道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)卷108)。(以后明道二年、庆历四年又下诏重申)这一行政措施跟文坛发展要求完全吻合,因而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,正如欧阳修一再指出,皇帝下诏后,“由是其风渐息,而学者稍趋于古焉”(《苏氏文集序》),“其后风俗大变。今时之士大夫所为,彬彬有西汉之风矣。”(《与荆南乐秀才书》)可以说,欧阳修是在比较顺利的条件下开展古文运

动和从事古文写作的，比起韩愈面临的“挽狂澜于既倒”、“摧陷廓清”的严峻任务来，他的困难和阻力要小，这也直接有助于他的中和之性、情韵之美的散文精神的形成。

洛中三年对欧阳修的散文创作道路发生过一锤定音式的重要作用。第一，编校韩集，写作古文。他自述：“举进士及第，官于洛阳，而尹师鲁之徒皆在，遂相与作为古文。因出所藏《昌黎集》而补缀之，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。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，而韩文遂行于世。”（《记旧本韩文后》）而欧阳修本人也从此学为古文，摒绝骈文。他说：“今世人所谓四六者，非修所好。少为进士时，不免作之。自及第，遂弃不复作。在西京佐三相幕府，于职当作，亦不为作。”（《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》）从此，古文成为他抒情述志、驰骋才华的理想领域，终生未渝。

第二，崇尚“道”的实践性性格。文道合一、以道为主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。韩愈论“道”，主要指儒家的礼治秩序、伦理关系，高言宏论，神圣莫犯。欧阳修却强调“切于事实”，突出“道”的实践性性格，大大缩短了“道”和人们的心理距离。洛阳时期他表达文论思想的文字不多，但已初露端倪。如明道二年写给求教者张棐的《与张秀才第二书》指出，“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，为道必求知古。知古明道，而后履之以身，施之于事，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，以信后世。”又说，“孔子之后，惟孟轲最知道，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、畜鸡豚，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。……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，盖切于事实而已。”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空谈性理或放言圣道的厌弃，表现出贴近现实政治和实际生活的倾向。

第三,提高知名度,声誉鹊起,为日后主盟文坛创造条件。一切文学作品只有被人阅读时才取得有实际意义的存在,文人集团作用之一,在于加强了这种文学交流的过程,扩大了作品的影响,从而帮助自己的成员获得社会的认可。苏辙《欧阳文忠公神道碑》说:欧阳修“补西京留守推官,始从尹师鲁游,为古文,议论当世事,迭相师友。与梅圣俞游,为歌诗相倡和。遂以文章名冠天下。”由此而增强了他在文坛的号召力和威望。

第四,孕育了他独特散文风格的胚芽。文学创作是文人集团活动的中心,在互相切磋、激励、竞争中,往往培养出一种新的欣赏习惯,使之成为较稳定的审美爱好。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卷八云:钱惟演“因府第起双桂楼,西城建阁临圆驿,命永叔、师鲁作记。永叔文先成,凡千餘言。师鲁曰:‘某止用五百字可记。’及成,永叔服其简古。永叔自此始为古文。”释文莹《湘山野录》卷中记此事略有差异,他说:“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,独载酒欲(往)之,通夕讲摩。师鲁曰:‘大抵文字所忌者,格弱字冗。……’永叔奋然持此说,别作一记,更减师鲁文二十字而成之,尤完粹有法。师鲁谓人曰:‘欧九真一日千里也!’”这两则文坛逸事,具体细节容有出入,但崇尚“简古”、“完粹有法”,力忌“格弱字冗”确是欧阳修散文风格的特点之一,也是他文论思想的一个要点(以后在《论尹师鲁墓志》等文中还有更多的发挥)。同时,文友间的切磋琢磨也有助于他散文风格的日趋成熟。他在嘉祐八年《集古录目录》自跋中说:“昔在洛阳,与余游者,皆一时豪隽之士也。而陈郡谢希深善评文章,河南尹师鲁辩论精博,余每有所

作,二人者必伸纸疾读,使得余深意。以示他人,亦或时有所称,皆非余所得者也。”时隔三十年,对“谢、尹之知音”仍拳拳于怀如此,足证切磋之功。尤应强调指出,对洛阳文人集团的追念成为欧阳修巨大的精神财富,这对形成他散文主体风格即“六一风神”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“六一风神”的审美核心,就是抚追今昔、俯仰盛衰、沉吟哀乐的情韵意趣,这集中表现在他为洛阳友人所作的墓志、祭文之中。如果不是以存亡离合感叹成文,不是把作者自身纳入其中,就不可能把这些实用性的墓志、祭文写成情辞并茂、声泪俱下的绝妙文字。本书所选《张子野墓志铭》就是一例。近代文学家林纾说:“欧文之多神韵,盖得一‘追’字诀。追者,追怀前事也。”又说:“欧公一生本领,无论何等文字,皆寓抚今追昔之感。”(《选评古文辞类纂》)堪称一语中的。对洛阳盛游的追思,对今昔盛衰悲剧性的人生体验,已成为形成他主体风格的切入口和契合点。

洛中三年是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初步丰收时期。现存这时期各类文章三十多篇,其中有不少富于文学性的散文。与上述情况相对应,这些散文的显著特点,一是学韩。如《杂说三道》、《伐树记》、《戕竹记》、《非非堂记》、《养鱼记》等,不仅《杂说三首》沿袭韩愈《杂说四道》的题目和手法,而且其他几篇“记”实质上也属特殊的“杂说”寓言,都借用具体事例阐发某种哲理或人生思想,而这又承受了《庄子》的思想熏陶。二是崇尚简古的风格。这些文章大都篇幅较短,文字洗炼简洁,要言不烦。《戕竹记》结尾云:“推类而广之,则竹事犹未”,由小引大,含意颇

深;《养鱼记》结尾云:“感之而作《养鱼记》”,所“感”为何,不明言而妙在不言之中。三是多骈偶句式。如“且戕且殄,不竭不止”,“服上官为慢,齿王民为悖。”(《戕竹记》)“不方不圆,任其地形;不斲不筑,全其自然。”(《养鱼记》)大抵受积习所使,摇笔自来,他后来才自觉吸收骈文的艺术长处,达到另一境界。总之,这时的散文还处在练笔阶段(这可能是大都未收入他亲自审定的《居士集》、而被后人编入《居士外集》的原因),但已初步显露出构思运笔的较高才能和自己的独特风格。

## 二、革新弊政的志士,振兴文运的宗师 (1034—1045)

从景祐元年(1034)到庆历五年(1045),是欧阳修政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又一个重要时期。他历任馆阁校勘、夷陵令、乾德令、滑州通判、知谏院、知制诰等职,经历了在朝——外贬——在朝的曲折过程。两次在朝,他积极参与了范仲淹等革新派和吕夷简、夏竦等守旧派的激烈的政治斗争,而第一次夷陵被贬对他的思想、性格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宋朝比之以前的几个统一王朝来,是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朝代。这一方面对于巩固宋王朝的统一、安定社会秩序、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,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;另一方面,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、战斗力削弱;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、腐败无能;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者的穷奢极欲、挥霍享

受,再加上每年向辽、西夏输币纳绢,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。开国不过三十多年,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、李顺的农民起义,人数达几十万。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、内外社会矛盾急剧发展的情况下,封建士大夫中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“变法”,改革弊政,形成了变法运动。范仲淹的“庆历新政”就是最初掀起的一场政治改革。欧阳修在景祐年间严斥附和吕夷简的谏官高若讷,为范仲淹贬官饶州鸣不平,因而自己也遭外贬夷陵的打击;而在庆历新政期间,他更积极出谋划策,努力于舆论宣传,与参政范仲淹、枢密副使富弼、韩琦一起,成为新政的核心人物。这是他一生中政治上最为进取的时期。

宋代的古文运动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革新运动的一翼而出现的,因此具有鲜明的教化辅政的目的。范仲淹早在天圣三年的《奏上时务书》中,就提出“国之文章,应于风化;风化厚薄,见乎文章”,强调文章与社会教化的密切关系,要求在政治改革的同时,“兴复古道”,“救斯文之薄”。在庆历新政时,更兴建太学,改革科举,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,注重策论经义,使“天下学者日盛,务通经术,多作古文”(欧阳修《条约举人怀挟文字劄子》)。随着政治革新浪潮的推进,古文运动也随之扩大了社会影响,吸引了众多的士人从事古文的写作。同时,欧阳修在文坛的地位也日益提高,终于成为公认的领袖。他自己在宝元二年所作的《答梅圣俞寺丞见寄》诗云:“文会忝予盟,诗坛推子将。”大概因该年谢绛死去,故而和梅尧臣二人分别负起“文会”、“诗坛”的领导责任,这可能还属于某一局部的文人范围之内。而范仲淹于庆历八年所作的

《尹师鲁河南集序》，则概述宋初以来的文坛大势说：“懿、僖以降，寢及五代，其体薄弱。皇朝柳仲涂（柳开）起而麾之，髦俊率从焉。”“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，不逐时辈。从穆伯长（穆修）游，力为古文。而师鲁深于《春秋》，故其文谨严，辞约而理精。章奏疏议，大见风采，士林方耸慕焉。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，由是天下之文一变。”他是从文坛全局立论，肯定欧阳修在当时转变文风中的关键性作用。

与这种社会思潮和欧阳修文坛地位相适应，他的文论思想也臻于成熟。《与荆南乐秀才书》、《答孙正之第二书》、《答吴充秀才书》、《答祖择之书》这些指导各地士子的书简以及随后的《苏氏文集序》、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、《答宋咸书》等文，都是有代表性的文论之作。他仍然标举“我所谓文，必与道俱”（苏轼《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》引）的重道旗帜，但对“道”的内涵作了新的阐述：一是继续发挥《与张秀才第二书》中“道”必“切于事实”的思想，强调“道”必须和实际生活中的“百事”相联系，反对“弃百事不关心”（《答吴充秀才书》），重视“道”的实践性性格；二是提出“圣人之言，在人情不远”的思想（《答宋咸书》），对“圣人之言”，其着眼点不在它所规定的人伦关系中尊卑名分的等级性，而是突出其中的感情联系和交流，不使感情因素被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所吞噬。这就把抽象的、理念性的“道”，转换成具体的、实在的、充满情性内涵的“道”，与他散文中“信实性”和“抒情性”的特点正复一致。

其次，强调“文”的独立价值和作用。他说：“古之学者非一家，其为道虽同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。”（《与乐秀才

第一书》)又说:“其见于言者,则又有能有不能也。”(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)都从作家才能或文体、风格的不同,来说明道是不能完全代替文的。他还说:“君子之所学也,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,事信言文,乃能表见于后世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,皆善载事而尤文者,故其传尤远。”(《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》)提出“事信言文”兼重的命题,肯定“文采”对传之久远的重要作用。这里有必要弄清“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”(《答吴充秀才书》)和“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,皆可悲也”(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)两句话的含义。前句来源于“有德者必有言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的古训,后句又与道学家“玩物丧志”说相类。实际上,前句主要是“充道为文”之意。他说:“道纯则充于中者实,中充实则发为文章辉光。”(《答祖择之书》)这是对韩愈《答李翊书》“根之茂者其实遂,膏之沃者其光晔”的发挥,其主旨在于从文人修养的角度来讲文学才能的提高、作品艺术感染力的获得。后句是从整篇文章“三不朽”的题旨出发,强调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三者必须以“立德”为本,而且徐无党已有文名,“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”,同时,“予固亦喜为文辞者,亦因以自警焉”。在他心目中,首先应以道德家、政治家自期,其次才是文学家,但这并不意味着对“文”的轻视和否定。他后来在论及为杜衍作墓志时说过:“平生知己,先相公(杜衍)最深,别无报答,只有文字是本职,固不辞。”(《与杜沂论祁公墓志书》)说明他终究是位毕生“尽心于文字”的文人。

这时期的散文创作有几点值得注意。第一,与他的政治活动紧密配合,他写了不少有关政治革新的文章,仅

奏议就多达六七十篇，政论有《原弊》、《纵囚论》、《本论》等，《与高司谏书》、《朋党论》更是传诵一时的名作。这些文章词气严正，说理透辟，表现了一位政治家凛然的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，也是庆历新政的可贵的历史文献。第二，由于文名卓著，他应请写了不少墓碑文。这时期有名的有《张子野墓志铭》、《黄梦升墓志铭》、《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》等，这些墓主大都很少有勋业政绩可以称述，他因而采取从虚处落笔的手法，或以交游聚散感叹著文，或从亲人口述笔录成篇，充满了缠绵呜咽的情韵，为墓志铭的写作别辟一途。他以后写的《尹师鲁墓志铭》、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并序》等，则强调简古的文字风格和突出大节的写作原则。然而，精心选择富有生活气息的典型事例，以表现人物的精神性格，则是他墓碑文的共同特点。第三，与曾巩擅长目录序、王安石工于经义序各异其趣，欧阳修以精于诗文集序著称。这时期所写的《释惟演文集序》、《释秘演诗集序》开了此类书序的先河。这两篇为佛门中人所作的诗文集序，颇受韩愈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以客映主手法的影响，但已显出学韩能化的境界。以后他又陆续写了不少书序名篇，对这一文体的写作提供了多方面的艺术经验。

### 三、宦途的再贬，风格的成熟(1045—1054)

从庆历五年(1045)到至和元年(1054)，是欧阳修第二次被贬外任时期。范仲淹为首的新政在守旧派的攻击下不幸失败。庆历五年，欧阳修又为“盗甥”的流言不明